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

张汝伦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80345

G 2-33
6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

张汝伦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 新登字114号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

张汝伦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4.5 字数320,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013-6/B·27 定价:17.00 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还谈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明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人

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属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覆考虑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

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

(代编选者序)

张汝伦

严格地说,编一个思想家的文选应该是对其思想的一种阐释方式,尤其如果这个思想家著作等身,且涉及面广,影响大时,就更是如此。全集的好处是照单全收,不留子遗,给研究这个思想家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全集就像采来还未及加工的矿石,固然很有价值,但若耍发挥影响和作用,则必须再进行一番筛选。对于研究思想的学者来说,那些难以避免的纯粹应酬文字显然是多余的东西。精心选编的文选虽无面面俱到的好处,但却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来集中选录一些有关文字,既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把握,又突出了思想家在某些方面的过人之处和价值。这是我选编这本《蔡元培文选》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蔡元培全集》已经问世,他的哲学文选、美学文选和教育文选也早已出版,后两种文选还各有不同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再编一本《蔡元培文选》是否值得和必要?时下从生意眼出发胡编名人文集已成风气,但这正是我所不屑的。

然而,当有朋友建议我来选编一本《蔡元培文选》时,我却欣然接受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蔡元培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思想家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了。这只要看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就可以知道了。人们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对他领导北大的成就尤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但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他一些具体的教育主张上,而未深入这些主张后面有时并未明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人们也研究谈论他的美学思想,却很少探讨美学在他全部思想中的作用和意义。除此之外,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就不多见了。这与他在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不相称。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是要对五四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可是,近年对陈、胡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却少有把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的近代思想家来系统研究的文字。这似乎说明,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近代思想家的地位,实际并未得到人们的承认。选编这本《蔡元培文选》,是希望读者通过研读收在这本选集中的蔡元培的文字,能对蔡元培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有一个新的评估和认识,并进而对现有的近代思想史本身也能有若干反思和质疑。

二

无论从哪方面看,蔡元培无疑都属于主要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之列。他的重要不仅在于他曾对他所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化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在于他代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种重要但却被遗忘、忽略或贬低的思想倾向。陈独

秀和胡适虽然在思想倾向上有重大不同,但在不少重大的文化思想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尽管我们现有的近代思想史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作为同样在五四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蔡元培与陈、胡不仅在思想倾向上有重大不同,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上,也有重要不同;在各人的文化活动实践上,更有不同。这种重要的不同却因为五四时蔡元培正巧是北大校长,并写了那封著名的答林琴南函而往往被人忽视。这两个忽视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熟悉的思想史叙述方法是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既然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当然他就是陈、胡的同道。却未看到维护陈、胡不受外界攻击,并非等于与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完全一致。胡适之也反对过蔡元培“兼容并蓄”的立场。非此即彼的二分叙述模式之不适用于蔡元培,既说明这种叙述模式本身的问题,也说明了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虽然蔡元培比陈独秀和胡适要年长一辈,但从他们面临相同的时代问题来看,他们可以算同时代人。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化,以其深重的危机向一切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国家与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但现实政治的危机以其现实性和急迫性遮蔽了同样深重的文化危机。人们往往是从政治危机才推导出和感觉到文化危机,而没有看到,一个从未与另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大规模接触,并且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早已失去其自身更新变革机制和因素的文化,一旦面对另一种具有多方面优势的文化时,不可能不发生根本动摇。但现实问题的紧迫性使人无暇在更深的层次上考虑问题。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和知识分子考虑的中心问题。蔡元培也不例外。目睹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毫无希望,他毅然放弃自己的功名前途,直接投身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握笔的手居然也去造

炸弹，谦谦君子“老好人”也鼓吹过暗杀。

但严格说来，蔡元培不是革命家。“迅速改变”或“根本解决”从来不是他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光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种种问题要靠学问，也就是科学来解决。另一方面，人的素质也关系到国家兴衰，“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1〕因此，“文化与物质生活之改造同时重要”。〔2〕因此，早在五四运动请出“德”“赛”两先生前七年，即辛亥革命一结束，他就在《社会改良会宣言》中提出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迷信”。〔3〕在他看来，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和文化问题。改造社会，先要改造教育；挽救危亡，先要从学术方面努力。〔4〕这是蔡元培对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个基本考虑。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下（直到今天恐仍是如此），一谈文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中掺杂着大量复杂的政治因素外，还在于人们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不仅有本质的区别，还有价值的区别。前者往往和“旧”、“古代”、“落后”甚至“迷信”相联系，而后者则是“新”、“现代”、“进步”和“科学”的象征。当然，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价值区分则另有一套。但“截然不同”往往是不同立场人的共同预设。蔡元培则不然。他完全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或新旧文化观。他相信人类既然有共同的经验，就会有普遍的原理，人为划分中西，新旧的畛域，用西学打倒中学，或用中学抵制西学的态度是他坚决反对

〔1〕《蔡元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卷，第8页。

〔2〕《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19页。

〔3〕《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7页。

〔4〕《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91页。

的。他认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1〕他明确指出：“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2〕所以他主张对文化要有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切忌盲从、守旧与空谈。在答复何炳松等人征求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宣言的看法时，他写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的善，怎样是人类公认的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人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3〕

正因为不把中西文化截然对立，所以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坚持调和会通的态度。他念念不忘的不是不思变革的抱残守缺，或泛政治化的否定批判，而是积极的文化建设。因为这才是立国之本。而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必须会通吸收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秀成果方能有所成就。因此，无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他都持一种理性的、批判的开放态度。蔡元培从小受的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教育，耳濡目染，浸润很深。传统文化对他一生的思想

〔1〕《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83页。

〔2〕《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5页。

〔3〕《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84页。

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本身的不足和停滞,尤其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与西方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为此,他始终积极鼓吹“输入欧化”,并且还主张“欲输科学智识于东亚,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1〕他虽年届不惑,又曾有“翰林”、“总长”的头衔,却两度负笈西洋,实地研究西方学术。根据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听课记录,他最少一学期听四门课,最多时一学期听十门课。科目包括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等。在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他曾这样描写自己这段学习生活:

“至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为鞭策,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以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作之脾气,详于小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又不能改,故沈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2〕

从这段明显自谦的话中,亦可看出他当时学习西学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夫。正是由于这种认真虚心的态度,比起同时代许多出洋留学的人来,蔡元培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比较透彻

〔1〕《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页。

〔2〕《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14页。

和深入的。“在革命元老中，我认为他比较真正认识西方思想。他书真正看，而思路通达。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是不容易，否则班门弄斧，人云亦云而已”。〔1〕林语堂的这段话的确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但是，要不‘班门弄斧，人云亦云’，光是认真学还不行，还必须始终有“我”，始终有自己判断和批评的头脑。而这正是蔡元培对待西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刚接触西学时，他就对别人说：“时无古今，地无中西，凡所见闻，返之吾益已益世之心而安，则虽阻之以白刃而必行；返之吾心而不安，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2〕他虽力主全面引进“欧化”，但又始终强调要能批判地吸收消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同化。”〔3〕这种态度在当时即使不是空谷足音，也是独树一帜。当时对待西方文化不是“视西学为神圣，视西人为帝天”的完全无“我”态度，就是冥顽不化，极端排斥的自我封闭态度。后一种态度的危害大家比较清楚，前一种态度的危害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一直到最近，还有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西化得不够。其实问题不在西化与否，而在于能否化西为我。没有自己理性的批判头脑，就既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更谈不上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在接受西学上的根本问题不在不肯学习，

〔1〕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大成》杂志，第67期。

〔2〕 《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92页。

〔3〕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页。

目 录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代编选者序) 张汝伦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1

学堂教科论..... 5

中国伦理学史 19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127

中学修身教科书..... 135

世界观与人生观..... 240

《学风》杂志发刊词..... 245

华法教育会之意趣..... 252

华工学校讲义..... 255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292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295

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 298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 302

以美育代宗教说..... 306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311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

上的演说词·····	315
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	318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319
哲学与科学·····	322
《国民杂志》序·····	327
教育之对待的发展·····	329
科学之修养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养会演说词·····	331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335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337
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	340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	342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345
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349
教育独立议·····	352
支那之专制政体·····	355
中国的文艺中兴	
——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演说词·····	358
中国教育的发展·····	366
在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上致词·····	374
美育·····	376
美育与人生·····	381
《新唯识论》序·····	383
保障民权·····	386
复国联文化合作院主任班纳函·····	389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392
《俞理初先生年谱》跋·····	401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408
复兴民族与学生	
——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	417
孔子之精神生活·····	421
《人与地》序·····	424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

今日为学社开学之日，我所演说者，即是表明学社命名之义及一切课程之关系。学社品格，当属于通俗语所谓学堂一类。学堂本吴中学塾之通名，而近则以为分班教授诸院塾之大别名，盖分班教授法，始于上海西人之学塾，故从吴语而他处借以为分别文耳。

学塾繁多，不可具数，今最著者，为学官、书院、学堂三大支。学官最古周制，与西人同，其后流为史官素餐之地，于是矫之以书院。自宋以来，颇持清议，其后又流而师生牟利之地，于是矫之以学堂。然而学官如故，书院如故，则我国恋旧之习太深也。因旧属之颓败，而改造者不尽撤蠹蚀之料，则蠹必传。因旧肆之折阅，而改为者不尽去舞弊之人，则弊愈广。夫是以书院之起，非不与学官竞争，不久而与之俱化。今学堂之起，其将竞而存与，抑亦与之化与？是无他责，责主持学堂者而已。

夫主持学堂者之宗旨，恒见于其所系之专名。善乎许秋帆先生之设学堂也，名之以崇实。孔子言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 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主讲许研农等邀请蔡元培前往观礼，发表演说。当晚，“研农来，属撰学社记，并笔记所演说者付录”，（《杂记》手稿）遂写出此篇。标题为编订者所加。